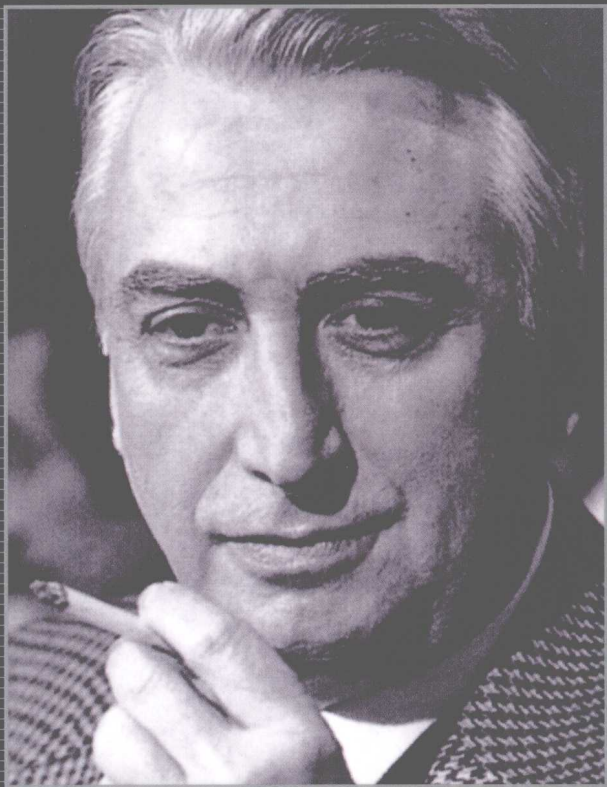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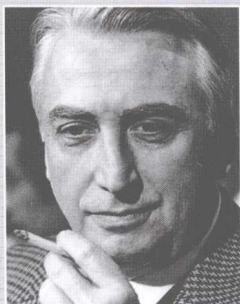
L'aventure Sémiologique
符号学历险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L'aventure Sémiologique

符号学历险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李幼蒸/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符号学历险/ (法) 巴尔特著; 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罗兰·巴尔特文集)

ISBN 978-7-300-08832-7

I. 符…

II. ①巴… ②李…

III. 符号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0052 号

本书的出版经由法国外交部资助

罗兰·巴尔特文集

符号学历险

[法] 罗兰·巴尔特 著

李幼蒸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插页 3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4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罗兰·巴尔特，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其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他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辉映，并被公认为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

罗兰·巴尔特在法国开创了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深层意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发表了大量分析文章和专著，其丰富的符号学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巴爾特的符号学理论，从崭新的角度，以敏锐的目光，剖析了时装、照片、电影、广告、叙事、汽车、烹饪等各种文化现象的“记号体系”，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及历史的方式。晚期巴尔特对当代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超越了前期结构主义立场，朝向有关意义基础、下意识心理、文学本质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认识论问题的探讨。

罗兰·巴尔特对于西方未来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学术遗产对于非西方文化思想传统的现代化发展，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他的思想和研究领域宽广，其作品适合于关心人文科学各领域、特别是文学理论领域的广大读者研读。

罗兰·巴尔特文集

- 写作的零度
- 米什莱
- 埃菲尔铁塔
- 符号学原理
- 符号学历险
- 文艺批评文集
- 罗兰·巴尔特自述
- 如何共同生活
- 中性
- 小说的准备
- 罗兰·巴尔特传（附卷）

策划编辑：李 颜

责任编辑：胡 颖 翟江虹

封面设计：王强工作室

总 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 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 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

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 Urt 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 Montparnasse 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二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二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

而后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 20 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 19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 20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须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二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 10 卷 12 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

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 写作的零度 (1953) · 新文学批评论文集 (1972) · 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 (1977)：李幼蒸

2. 米什莱 (1954)：张祖建

3. 文艺批评文集 (1964)：张智庭 (怀宇)

4. 埃菲尔铁塔 (1964)：李幼蒸

5. 符号学原理 (1964)：李幼蒸

6. 符号学历险 (1985)：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 (1976)：张智庭

8. 如何共同生活 (讲演集 1) (2002)：张智庭

9. 中性 (讲演集 2) (2002)：张祖建

10. 小说的准备 (讲演集 3)：李幼蒸

附卷：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 (Eric Marty) 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 5 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

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于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

“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厢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 and 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映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译者前言

在这套 10 卷本的《罗兰·巴尔特文集》中，《符号学原理》和本书《符号学历险》，是比较偏于符号学方法论技术性讨论的。实际上法文原版中，前书本来是后书第一篇中的部分内容，考虑到《符号学原理》内容的独立性和篇幅的长度，我们才决定像该书德译本和英译本的做法一样，将其抽离出来，单独出版。《符号学历险》是在作者故世后，由其好友哲学家兼专职编辑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什么是结构主义》一书的作者。他们两人均参加过 1974 年著名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访华团”）选编的。由于巴尔特大部分作品均为中短篇，主题比较分散，这部选集不仅内容较为丰富全面，而且编选精当，便于读者系统地把握作者的思想，

所以在1985年出版后相当流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这部选编，实际上包括了两大部分内容：叙事符号学的原理和实践，以及根据符号学方法对历史思想和现代文化进行的意义构成分析（包括古典修辞学史的构成分析）。如果说《符号学原理》主要从横向或系统的角度，论述“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符号学历险》则侧重于将符号学知识运用于思想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结构分析和文本分析实践。本书各篇均为作者讲稿辑录，显示出师生对话的文体和风格。换言之，讲演者作为结构主义“作者”，甚至于是通过讲述过程来呈现其本人思想探索的历程的，其讲课过程，也即思想创造过程，也就自然流露出任何精神创造初始阶段中所含有的探索性或“冒险性”（指对传统、主流、权威的批评和背离部分）。

被编者选为本书“导论”的文章，原为作者在1974年米兰首届“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大会”的讲演稿。我在了解了此文背景后曾向上届学会会长德国罗兰·波斯纳询问情况。他告诉我确曾亲自参加该会。IASS自1969年创建后，包括欧美和东西方各国符号学家，但因当时东欧政治情况复杂，未能顺利召开大会。于是，当时仅为“助理教授”的年轻学者艾柯（Eco），毅然倡导在米兰举办了首届国际大会。艾柯是新闻记者出身，据说自60年代初有一次在听过巴尔特讲演后，对自己先前的文化分析文章不免有些“自惭形秽”，从此积极转入符号学研究。巴尔特在此次国际大会上的发言，反映出当时西方不同学者对于“符号学”身份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波斯纳在来信中感慨说，他们当时与会的各国青年人文学者都被大会煽起的“科学革命”热情所感染（遂于次年在德国发起创建了德国符号学学会），而巴尔特在此公然反对一种符号学“科学

观”。巴尔特这篇讲演稿，以及收入本书的各篇文字，多为其在各相关课题领域内的“开山之作”，而相关主题其后几十年自然继续有发展和变化。但作为这些研究课题的创始人之一的巴尔特，在各篇中特别表现出了如何根据新的视角来处理旧的论题的构想和尝试。这对于我们今日的东方人文学者如何从新的视角来思考旧的题材来说，意义自然特别重要（甚至于比西方人更重要）。作者在这篇导论中简要回顾了相关问题、背景、构想和展望的方方面面。虽然是“一家之言”，一向温文尔雅的作者，却在此讲演中把符号学看成了法国人的专利。为什么？编者瓦尔在回忆好友巴尔特时曾说：“他最不喜欢与人争执！”但我们都知道，60年代中期，当时尚非正教授的巴尔特，曾因拉辛研究方法问题与大学名教授皮卡尔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争论。这是有关学术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于理于义，岂容回避？（事过境迁，今日来看，实际上双方各有其理，各有其用。但不同意见均应公之于众，以使后人得以了解全面。）巴尔特对自己和法国同事的符号学方向的绝对肯定，其自信来自哪里呢？本导论特别对“符号学历险”的意思做了说明。这部讲稿汇编，也较清楚地展现了作者的“符号学创新实践”涉及范围之广、之深，因此他确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法国符号学的“创始人”——比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第一身份一定是“人类学家”，格雷马斯（Greimas）的第一身份多半是“语义学家”，只有巴尔特是以“符号学家”名义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这个比喻意义上的“创始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作者坦承，他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无不来自他人，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将甲的理论方法“恰当地”施用于乙的文本上去；他只是理论的“综合实践者”而不一定是理论的创造者。时人比高比低，“专业”成为“排比”的物质性依据，

而巴尔特强调的是总体学术方向，这个有关方向的学术判断，必须“集众家之言而有以超越之”。这正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学术生产不应该是像商品生产那样以最终让各家均“获一己之利”为目标，而应着眼于人类集体的真知探求。为此必然需要在万千专业深耕的基础上进行横向贯通，以成就解释学上“临门一脚”的总体实效。在此意义上，“巴尔特学术现象”不过是因缘际会、水到渠成而已。他和列维-斯特劳斯共同领衔所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可视为人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探讨方面的阶段性“集大成”工作。

巴尔特是思想和文化的“意义分析家”，他将新的视角、方法和目标施用于旧有的文本材料上去。巴尔特的“价值”正体现在此创造性的“意义分析实践”之上。这样，他就对世人理解传统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方式产生了一种冲击效应。巴尔特不是要在各个传统学科领域内部去营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是通过“贯通”文史哲艺各科理论，来重新读解各个领域内文本的多重意义结构，以图系统地提升人类对传统文化的“可理解性”。所谓学术思想的“革新”，首先是“价值标准”的革新；如果延续传统旧标准，满足于在某一学科专业内的技术学之成，自然不会接近巴尔特之类的“学术新思维”。学科内容的意义和理解都是在传统学科结构和程序中“钉死”的，学习了学科“专业”就是接受这些既定的专业内容及其结构和程序，不存在什么按新方法寻求历史文化之意义和理解的需要。简言之，学科“专家”习惯于历史纵向内形成的定式思维，“符号学家”则强调横向的“理解”贯通。而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解”，不是指学科内容的简单并列和比较，而是指在一般思想层面上的打通、提升、深入。为什么有此需要？两百年专业现代化过

程之后的新时代，要求学术贯通的根本理由在于学科专业内学术思想机构的局限性已被日益感受到，而专业权威们以专业为职业利益之根基，所重视的是对专业技术面的“掌握”、运用和传播，遂体现为技术面上的以“量”取胜，因此忽略了一般思想之质量提升的问题。符号学家由于跨越专业藩篱，倾向于综合运用多学科材料和方法的资源，以便重新组织思维和学术，他们的观察、思考、目的，也就与专家型学者拉开了距离。其直接结果是，观察到和分析出传统学术思想本身的混乱、呆滞、保守和无效。（泥执古典者的痼疾在于不知道古典遗产只是“材料”，不是价值和方法的来源。在此问题上，虽领域不同，顾颉刚氏与巴尔特氏，何其相似乃尔！）结构主义运动最积极的成果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学问”不再是指对社会传承的学科资料本身进行的记诵，而是依据现代认识论、方法论对古典资料进行的分析和理解。而今日对古典学问的“深入理解”则必须超出本专业之格局。因此从方法论角度看，学问的高级目标在于探索学科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法国结构主义者所说的“文本间性”，不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理解作“意义的永恒流动”，而不妨理解作一种“学科间性”，即学科间理论的互动关系。

当然，迄今为止，“符号学”的主要成效，仍然是表现在批评性方面，也就是批评传统学术思想内部的大量历史存留问题。在此意义上，巴尔特符号学，就是一种学术、思想、文化的批评学。为了使此批评实践提升效力，需要先组织一套（甚至于只是临时性的）分析原则和程序，置于分析实践开头，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思考方便，也是为了读者的读解方便。这样就产生了若干符号学“理论”，所谓理论不过是具体意义分析实践的程序性总结、前提和运作框架，其内容大量取自其他学科成果，其中符号学家的工作主

要体现在其对不同材料进行“搭配”的方式或设计上。在本书各篇中，以及在当代电影符号学文本分析中，随时会看到文本分析之前的理论性前导。符号学家的分析实践是自下而上的，是在文本细节字面上具体地去“感觉、分解、拼合、理解”。关键的是对文本内容意义结构进行多层次、多方面、一致性的探索。符号学实践是一种意义读解法，是一种理论层次上相当谦逊而读解层次上相当细致的实验。经过符号学的意义分析实践，我们会发现传统文本的意义结构比专家们理解的深广复杂得多。这往往是古典文本“制造者”的“旧心智形态”和现代读者的“新心智形态”之间的触碰、冲突、调节、理解的过程。不要忘了，今日符号学实践只能发生于索绪尔之后，而索绪尔只能发生于近代科学之后。而古典学科的专家们，却因偏重学科历时性过程中的传统方法论积累和其专业运作的固定技术性条件，所以才对新学术、新思维的合理要求视而不见（一些西方哲学家，或以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家，特别欠缺对法国结构主义的同情，此因他们一来囿于“理论即系统”的偏见，二来因为都不曾“感受”索绪尔“二分法”的奥妙之所在。顺便指出，不懂“所指—能指”的意涵，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巴尔特的文化理论思想的价值）。

巴尔特和法国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普遍功利主义学术心态不同，其思想探索的创造性动力来自其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本身。巴尔特是“为思想而思想”的时代大思想家，其真纯的思想家人格（绝非皮卡尔等传统型学者所讥刺的哗众取宠之辈）是其思想学术产生全面持久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但是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成就绝不是没有缺点，或只能盲目加以遵循的。我们应该理解此处所说的历险、探索或挑战的符号学实践，必然包含着其自身的局限和弱